



Rejecting Anti-Aging: Reflections on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Coming of Age*

Chizuko UENO Translated by Weiwei LU

Abstract: Simone de Beauvoir published *La vieillesse* (*The Coming of Age*) in 1970 at the age of 62. In this book, she portrays ageism, i.e., the stigmatization of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elderly, as a disgrace to civilization. Although modern society worships youth, every human being will eventually grow old. Rejecting anti-aging means two choices: to try to stay young until death or to accept aging and inevitable frailty.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Beauvoir's work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oday's super-aged society and the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m.

Keywords: rejecting anti-aging, Simone de Beauvoir, ageism

Author: Chizuko Ueno is Professor Emeritus in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hair of the NPO Women's Action Network (WAN), and Representative Director of the Chizuko Ueno Foundation. She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IME* magazine'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f 2024." Born in 1948 in Toyama, she earned her Ph.D. in Sociology from Kyoto University. Ueno has held numerous academic positions, includ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Heian Jogakuin Junior College, Visiting Fellow at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sociate Professor at Kyoto Seika University, and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El Colegio de México. In 1993, she becam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Lett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in 1995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re. Since 2012, she has served a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Ritsumeikan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former member of the Science Council of Japan. Her academic expertise lies in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with additional research focusing on eldercare and caregiving. Ueno's major works include *Kafuchōsei to Shihonsei*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0, 2009), *Nashonarizumu to Jendā* [Nationalism and Gender] (Tokyo: Seidosha, 1998), *Kindai Kazoku no Seiritsu to Shūen* [The Formation and End of the Modern Family]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4), *Onnagirai* [Misogyny] (Tokyo: Kinokuniya Shoten, 2010), *Tōjisha Shuken* [Sovereignty of the Concerned Parties] (Revised Edition, co-authored with Masashi Nakanishi, Tokyo: Iwanami Shinsho, 2024), *Kea no Shakaigaku* [The Sociology of Care] (Tokyo: Ohta Publishing, 2011), *Ohitorisama no Saigo* [A Solo Journey to the End of Life] (Tokyo: Asahi Shimbun Publishing, 2015), *Zaitaku Hitorishi no Susume* [Farewell to the World from a Familiar Home] (Tokyo: Bungeishunju Shinsho, 2021), *Ueno Chizuko ga motto Bungaku wo Shakaigakusuru* [Chizuko Ueno'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Studies] (Tokyo: Asahi Shimbun Publishing, 2023), and *Konna Yononaka ni Dare ga Shita* [Who Made This World the Way It Is?] (Tokyo: Kobunsha, 2024). Her works have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in China, with titles are too numerous to list here.

Translator: Weiwei LU is currently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from Overseas. Her primary research areas are Japanese Folklore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拒絕“抗衰老” ——讀波伏娃的《老去》^①

上野千鶴子 撰 陸薇薇 譯

[摘要] 西蒙娜·德·波伏娃於1970年（時年62歲）出版著作《老去》。在書中，她把對老年人的負面形象塑造與侮辱性對待，即“年齡歧視主義”稱為我們文明的恥辱。儘管現代社會崇尚青春，但人類終將走向衰老。反年齡歧視主義存在兩種維度：其一是永葆青春直至死亡，其二是坦然接受衰老和不可避免的脆弱。本文通過解讀波伏娃的著作，探討超老齡化社會下人類所面臨的挑戰與應對之策。

[關鍵詞] 拒絕抗衰老 西蒙娜·德·波伏娃 年齡歧視主義

[作者簡介] 上野千鶴子，社會學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NPO法人Women's Action Network (WAN) 理事長、上野千鶴子基金代表理事、美國《時代》雜誌“2024年度最具影響力100人”之一。1948年生於富山縣，獲京都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歷任平安女學院短期大學副教授、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客座研究員、京都精華大學副教授、波恩大學客座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墨西哥學院客座教授等職。1993年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95年任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研究科教授。2012年任立命館大學特聘教授。前日本學術會議會員。專業領域為女性學與性別研究，同時從事老年人護理和照護研究。主要著作包括：『家父長制と資本制』（《父權製與資本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2009年）、『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民族主義與性別》）（東京：青土社，1998年）、『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東京：岩波書店，1994年）、『女ざらい』（《厭女》）（東京：紀伊國屋書店，2010年）、『当事者主権』（《當事人主權》）（增補新版）（與中西正司合著，東京：岩波新書，2024年）、『ケアの社会学』（《照護社會學》）（東京：太田出版，2011年）、『おひとりさまの最期』（《一個人最後的旅程》）（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5年）、『在宅ひとり死のススメ』《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別》（東京：文春新書，2021年）、『上野千鶴子がもつと文学を社会学する』（《上野千鶴子社會學視角的文學研究》）（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23年）、『こんな世の中に誰がした』（《這世道由誰造就》）（東京：光文社，2024年）等，她的著作在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書名此處不一一盡列。

[譯者簡介] 陸薇薇，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海外中國史料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民俗學、性別研究。

① 日文原文載於《実存思想論集39号「ボーヴォワールとサルトル」》（2024年6月），由其在存在主義思想協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文字整理者為長谷川晴生。作者、實存思想協會及出版社知泉書館已授予版權許可。

老去是文明的恥辱

我既不是薩特主義者，也並非存在主義思想的研究者。而且，我法語不好，讀不了法語原著，只能通過翻譯來理解。我曾在學生時代選修過大橋保夫老師的法語課，他被譽為箱根以西地區法語水平最高的人。遺憾的是，我沒能學有所成。所以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其實不夠格在這裡發言。我曾在2021年出版的《波伏娃的〈老去〉：我不抗拒年齡》這部著作中^①，解讀了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老去》（*La Vieillesse*）一書。我一向對專家心存敬畏，擔心自己的解讀可能會有偏差，於是特意邀請了兩位研究法國文學的專家審閱了書稿。也正因為我出版了這樣一部著作，所以才收到了存在主義思想協會的邀請^②。今天懷揣忐忑之情來到這裡。

自從很久以前拜讀了波伏娃的《老去》後，書中的這句話始終在我腦海中縈繞——“老去是文明的恥辱”。我因受邀在*Misuzu*雜誌上連載《拒絕“抗衰老”的思想——讀波伏娃的〈老去〉》系列文章，於是查閱了波伏娃的原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人類在其生命的最後15年到20年裡，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了我們文明的失敗。……那些勇於揭露危害人類制度的人，應該將這一荒謬絕倫的事實（醜聞）公之於眾。^③

日文版譯者朝吹三吉將此處的“scandale”（醜聞、恥辱）一詞，譯為“荒謬絕倫的事實”。波伏娃承擔起“揭露這一荒謬絕倫的事實（醜聞）”之重任。她強烈譴責社會對老年人持有的惡毒態度，甚至認為這種態度具有犯罪性質，因為它使得人們對待老年人的方式如同對待“非人”（即賤民）一般。

對於社會而言，“老去”似乎成了一種羞恥，甚至連談論都顯得不合時宜。……但正因如此，我才寫了這本書——為了打破這種共同的緘默。^④

要求人類在其生命的最後階段依然能保持作為“人”的尊嚴，這意味著一種徹底的變革。^⑤

波伏娃傳遞了一個極為強烈的訊息：這種“變革”並非僅靠思想上的覺悟就能實現。她這句話長久以來一直在我心中回蕩，仿佛是一道待我解決的課題。

作為“他者”的老去

波伏娃本人是如何體會老去這一過程的呢？

她說：“早在40歲時，我就曾站在鏡子前喃喃自語‘我居然已經40了’，全然不敢相信自已已步入中年。”^⑥在50歲時，一位美國女學生向她轉述了自己朋友的話：“這麼說，波伏娃現在是位老太太了吧？”^⑦據說這句話讓她震驚不已。

而我（上野）現在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太太”，今年即將步入“晚年階段”（75歲以上）。

① 上野千鶴子：『100分de名著 ボーヴォワール『老い』——年齢に抗わない』，東京：NHK出版，2021年。

② Japanese Society of Existential Thought，日本關於存在主義的研究組織。——譯者注

③ シモーヌ・ド・ボーヴォワール：『老い』（上巻），朝吹三吉訳，京都：人文書院，1972年/新装版，2013年，第12頁。

④ 『老い』（上巻），第6頁。

⑤ 『老い』（上巻），第13頁。

⑥ 『老い』（下巻），第333頁/新装版，第9頁。

⑦ 『老い』（下巻），第339頁/新装版，第15頁。

波伏娃認為，老去好似“他者”，是“他人眼中的我”之存在。她說：

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遇到某個熟人，幾乎辨認不出，而對方也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們。我們心想：他竟變了這麼多！而他一定也會這樣想：你竟也變了這麼多！^①

我很討厭參加同學聚會，因為不願看見或聽見這樣一個現實：我和這些老爺爺、老奶奶居然是同一輩人。（笑）

當我詢問周圍的人“你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變老了呢”時，發現很少有人能夠自己察覺到這一點。人們往往通過第三者的提醒才會發覺，比如在電車上被人讓座。對此，有些人會拒絕，有些人甚至會感到困惑和憤怒。而我則很高興有人為我讓座，因此盡可能站在年輕人面前。

還有，當被叫作“奶奶”時，人們也會察覺到年華不再。“祖母”是親屬關係的稱謂，當女性有了孫子孫女後，通常就會自動進入這一行列，但我們這一代的很多祖母都對“奶奶”這個稱呼感到反感。她們會努力讓孩子們叫自己“大媽媽”或直呼其名，這種努力令人動容。如果孫子孫女上幼稚園時提到自己的“大媽媽”和“小媽媽”，別人會問“你是有兩個媽媽嗎？”我想孩子們可能會感到困惑。像這樣，經由他人的言行來意識到自己的老去，大家或許都有過類似的經歷。

波伏娃在《老去》一書中，引用了許多以往文學作品中關於老年人的負面描寫。

比如屠格涅夫曾說：“你知道最糟糕的時刻是什麼嗎？就是年過55歲。”^②

我想，這個會場裡超過55歲的人應該占了一半以上，根據屠格涅夫的說法，大家正在經歷“最糟糕的時刻”。（笑）

此外，惠特曼曾寫道：“原以為他陰鬱而衰老，會用沙啞的聲音喃喃自語，但事實上他卻用尖銳刺耳的聲音喊叫著。”^③尤維納利斯則說：“他的容顏不再，令人厭惡，難以辨認。身體變成了骯髒的皮囊……”^④

如果僅僅是描寫他人，作家的筆觸尚可以如此刻薄且殘忍。

可正如波伏娃所言：“最大的問題在於自我否定感。人們曾經將老去作為他者之事而視若無睹，可當其變為自身之事時，便會產生自我否定感。”最嚴重的歧視莫過於自我歧視。對於來自他人的歧視我們可以反擊，但面對自我歧視卻束手無策。於是，我們可能會把老去的自己當成一個麻煩的累贅，感到無地自容，害怕給別人添麻煩，否定無能的自己。當然，這種現象並不局限於老年人。社會學研究表明，少數群體（minority）的自我認知折射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黑人和女性亦是如此。然而，白人幾乎不可能變成黑人，男性也幾乎不可能變為女性，但基本上每個人最終都會老去。因此，我們會把曾經對其他老年人抱有的歧視感轉移到自己身上——這就是波伏娃所說的老年人的自我否定感。

拒絕老去的思想——抗衰老

比較老年學研究表明，是否歧視老年人因歷史、社會和文化的不同而各異。在如今的日本，老年人被視為麻煩，但並非所有時代都是如此。比較老年學對老年人的地位變遷展開研究，其成果主要包含以下七點。一、老年人的地位與現代化程度成反比。即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高，老年人的地位就越低。二、人口老齡化率越低，老年人的地位越高。因此，在如今這般老年人數量劇

① 『老い』（下卷），第340頁/新裝版，第16頁。

② 『老い』（下卷），第335頁/新裝版，第11頁。

③ 『老い』（下卷），第366頁/新裝版，第42頁。

④ 『老い』（上卷），第141頁。

增的社會裡，其地位自然會下降。三、老年人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變革的速度成反比。而現代社會是一個社會變遷速度極快的社會。四、在定居型社會中，老年人的地位較高。而當下，我們正處於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五、在無文字社會中，老年人的地位較高。如今，我們不僅擁有文字，甚至還擁有人工智能。六、家庭規模越大，老年人地位越高。現代社會已是一個“單身家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七、老年人擁有的財產越多，地位越高。然而，並非所有老年人都很富有。

在動物社會中，儘管存在撫養幼崽的社會，卻沒有撫養年老個體的社會（據說哺乳類動物中或許存在例外）。年老個體被迫任其自生自滅。唯有人類社會會撫養老人。然而，如波伏娃所言：“在人類社會中，只有35%的人會真正撫養老人，其餘人群則對老人冷漠疏離。”儘管我不清楚波伏娃具體依據何種資料得出這一結論，但她確實曾接觸過當時最新的全球人類學比較資料——HRAF（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人類關係區域檔案）。

當老人身體尚且康健時，他們往往因仍具一定價值而略受重視。然而，一旦他們出現身體或精神上的殘疾或衰老的跡象，便會被視為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從而遭到冷遇。某些社會甚至會遺棄和殺害老人。波伏娃是一位博學多識的思想家，她曾讀過深澤七郎的小說《櫛山節考》（1956年），並將其視為“棄老殺老社會”的典型示例之一。

依據前文述及的衡量老年人地位高低的七項指標來看，美國社會中的老年人地位最低。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雖一生從未踏足日本，卻寫出了《菊與刀》（1946年）這部日美文化比較的經典著作。本尼迪克特認為，美國社會是一個“年輕社會”，“你很年輕”是一種讚美，而如果你被認為“老舊”，則意味著被社會所淘汰。同時，她也指出，日本的情況有所不同。從其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在本尼迪克特當時的調查對象——被美軍俘虜的日本士兵中，依然存在尊重長輩和長幼有序的價值觀。

有一個源自美國的概念叫作“成功老齡化”（successful aging），醫生日野原重明將這一概念引入日本並加以推廣。他活到了106歲，一直提倡“終身現役”（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的理念。成功老齡化的定義是“延長一個人的壯年期，直到臨終前”，即一種拒絕進入晚年的思想——不願看到、聽到或想到自己的衰老。換言之，這是一種希望在壯年巔峰期便溘然長逝的理想化想法，我們也可稱之為“抗衰老思想”（anti-aging）。

女性的老去

男女的衰老各不相同。身為《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在《老去》一書中特意用一整章的篇幅詳細論述了女性的老去。

在當時，詢問女性的年齡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即使現在，有些人在詢問女性的年齡時也會先說“抱歉”之類的客套話。不過，我自己對男女都習慣詢問年齡。因為通過詢問年齡，我可以更好地了解對方所經歷的時代。

有一則關於波伏娃的軼事。她因為終身未婚，直到晚年依然被人表面上恭稱為“小姐”。英語中“Miss”（小姐）和“Mrs”（夫人）的區別，以及法語中“mademoiselle”（小姐）和“madame”（夫人）的區別，近年來似乎已經消失。但在波伏娃所生活的時代，這種基於婚姻狀況的區分仍然存在。在那個時代，女性的年輕與美麗是同義詞。這一點在當時的日本尤為明顯，在法國也是如此。

於是，女性的價值被認為附有保質期。一些人將女性價值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的現象稱為

“逆年功序列”^①。因此，“年齡不詳”反而是對女性的一種誇讚，而被稱為“美魔女”的女性則開始將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身體保養上^②，由此催生出龐大的抗衰老市場。在化妝品市場中，抗衰老產品通常價格越高越是暢銷，儘管高昂的價格並不一定能保證效果的顯著。

在日本社會中，女性最理想的老去方式之一是“成為一位可愛的老奶奶”。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心中不禁五味雜陳。女性難道必須年少時是“可愛的女兒”，結婚後是“可愛的妻子”，老了之後成為“可愛的奶奶”嗎？換句話說，女性是否必須一生都保持“可愛”，以此換取他人的保護？最近，“可愛”一詞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不僅用於形容女性，還開始用來形容“叔叔”，甚至出現了“可愛的天皇”這樣的說法。^③然而，當女性被稱作“可愛”時，往往會感到喜悅，而男性卻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可愛”實際上是一種承諾，意味著“我絕不會對你構成威脅”，而男性大多對此十分抗拒。可以說，“可愛”是一種弱者的生存策略。那些“可愛的老奶奶”通常依賴家庭而存在。她們年輕時依靠父親，婚後依靠丈夫，到了晚年又依靠子女生活。

波伏娃的《老去》可以作為一本一流的民族志（ethnography）來閱讀，書中描述了20世紀60年代法國老年人的生活狀態。書中的許多內容引發了當今日本女性的強烈共鳴。例如，她在書中提到，女性普遍對丈夫退休感到恐懼。

丈夫整天待在家裡真是讓我難以忍受。他總是對別人做的事情不滿意，喜歡指指點點。……一旦退休，他就失去了活著的價值。我真的不希望他待在家裡。^④

日文版譯者朝吹三吉以女性化的語言風格翻譯了這些法國女性的陳述，而翻譯中的性別因素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當時的法國，退休後的夫妻關係也充滿了緊張與矛盾。

那麼，老人和成年子女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

成年人以一種隱秘而陰險的方式壓迫那些依賴他們的老人。……如果勸說無法讓老人妥協，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撒謊，甚至訴諸暴力。例如，他們可能會先勸老人暫時住進養老院，繼而將其遺棄在那裡。^⑤

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在我從事照護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入住養老院的決策幾乎百分之百由家屬做出，而非老人本人。入住養老院的主要原因中，大約七成是老年癡呆。家屬常常欺騙老人，把他們帶去養老院。他們可能會對老人說，“奶奶，我們去看櫻花吧”，然後把老人帶到養老院，並告訴他們這裡會提供可口的飯菜，接著就把老人遺棄在那裡。留在養老院裡的老人通常會感到暴躁不安，大聲喊道：“我為什麼要待在這裡，我要回家！”這種行為並不是所謂的病態表現，而是他們發自內心的哭訴。倘若不予理睬或加以安撫，經過一周或一個月後，他們可能會逐漸放棄反抗。此時，他們的平靜往往被解釋為適應了新環境。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這在《老去》一書中有清晰描寫。

許多退休的老人為了與孩子們住得更近而選擇離開原來的居所，但孩子們並不在意他們，結果，他們白白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方式。^⑥

對此我非常認同。為了和子女住得更近而搬家通常並不會帶來好的結果。如果同住，問題則

① 年功序列制是指日本企業按職工年齡、企業工齡、學歷等條件，逐年給職工增加工資的一種制度。——譯者注。

② 美魔女：指40歲左右，但堅持健身、保養，保持青春靚麗姿態的女性。——譯者注。

③ 大塚英志：『少女たちのかわいい天皇』，東京：角川文庫，2003年。

④ 『老い』（上卷），第312頁。

⑤ 『老い』（上卷），第254頁。

⑥ 『老い』（上卷），第308頁。

會更加嚴重。我認為，老年人應該獨自居家生活，而不要離開自己熟悉的住所。因為各種經驗資料表明，老年人滿意度最高的生活形態是不改變環境的獨居。

關於女性的老去，波伏娃這樣寫道：

老去對於男性和女性的意義和結果並不相同。對於女性而言，老去反而可能帶來一些特殊的優勢。更年期過後，女人不再具有性魅力，她們變得像未婚少女一樣，無需顧慮某些飲食禁忌。同時，她也不再受到月經所帶來的各種限制，可以自由地參加舞會、飲酒、抽煙，甚至可以和男人並肩而坐。^①

在這段話中，波伏娃描述了許多蒙昧社會賦予高齡女性的特權。而這些特權背後反映的是一種讓其“卸下女性身份”的社會共識，即高齡女性不再被視為“女性”，因而得以在某種程度上從社會角色中解放出來。該現象類似於日本所謂的“後家樂”——即丈夫去世後，作為家族繼承人的母親所享有的特權，那是一種類似于皇太后的權力。我認為，日本的“家制度”正是通過女性的共謀得以維持的^②。在“家制度”中，女性作為妻子不斷忍耐並服從，最終所能獲得的獎賞便是掌握家族實際權力的“皇太后”地位。正是由於這種獎賞，女性才會甘願忍耐“家制度”的壓迫。而波伏娃也關注到了這種特權，在書中有所提及。

老年人的性愛

波伏娃還清楚地指出，在老年階段，“性”對男女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她不愧是《第二性》的作者，以直白而深刻的方式探討了這一主題。

“生殖功能衰退或喪失的個體，並不會因此變成無性化的存在。”^③“即使是女性，也不過是被壓制了性衝動，而並非沒有性衝動。”^④

儘管如此，老年人的性欲仍然受到壓制，法國也不例外。

當老年人表現出與年輕人同樣的欲望、感情或需求時，他們常常會受到公眾的譴責。人們認為，老年人的愛情或嫉妒既醜陋又可笑，其性欲會令人厭惡，其暴力行為更是為人所不齒。^⑤

日本的老年性愛文學發展相對成熟，有谷崎潤一郎的《鑰匙》（1956年）、《瘋癲老人日記》（1962年）、川端康成的《睡美人》（1961年）等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大多集中於男性視角。另一方面，自21世紀以來，女性老年性愛文學逐漸嶄露頭角。例如，松井久子的《疼痛的人》（2021年）描寫了一位70多歲女性的性愛故事，在日本文學的性愛題材中，創下了迄今為止最高齡女性角色的記錄。中國臺灣的傑出女性作家李昂也圍繞這一主題進行了創作。她受到川端康成《睡美人》的啟發，創作了《睡美男》（2017年，日文譯本為2020年），這部作品被視為川端原作的性別翻轉版。《睡美男》在中國臺灣引發了巨大爭議，但我閱讀後發現，作品的主人公實際上是位50多歲的女性。僅是因為描寫了50多歲女性的性生活，竟然會成為醜聞，這著實令人費解。

一直以來，相比老年男性的性行為，老年女性的性行為更被視為禁忌。波伏娃在《老去》中

① 『老い』（上卷），第97頁。

② 家制度：將具有親屬關係的較小範圍的人組成一個由戶主領導的家庭。日本的家制度源於1898年（明治31年）《明治憲法》的規定。——譯者注

③ 『老い』（下卷），第375頁/新裝版，第51頁。

④ 『老い』（下卷），第412頁/新裝版，第88頁。

⑤ 『老い』（上卷），第8頁。

也提到了這一點。

歷史和文學都沒有留下關於老年女性性愛的清晰記錄。這個話題甚至比老年男性的性愛更難以啟齒。^①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老年女性認為，她們可以用年老體衰作為逃避性生活的藉口。

那些不願進行性生活的女性，往往以年齡為藉口，試圖躲避性愛。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年婦女，年輕時為了逃避“痛苦的夫妻生活”，曾請醫生開過診斷書，而上了年紀之後，年齡成了她更容易逃避性生活的藉口。^②

我們常常聽說法國是“愛情的國度”，法國的情侶情比金堅。然而，上述例子表明，法國也確實存在這樣的例外。

這與日本首次對高齡女性性行為進行調查的大工原秀子女士的研究不謀而合。作為一名保健師，大工原女士曾深入老年俱樂部發放問卷，儘管被人稱為“色情保健師”，但她依然將研究成果整理成書。^③根據她的調查，當時70歲以上的日本女性中，許多人坦言：“希望盡快結束那種痛苦的義務”“一生中從未體驗過‘性高潮’，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波伏娃的《老去》中也收錄了許多類似的證言，不禁讓人感歎：“原來法國也同樣如此啊。”

那麼，波伏娃本人的性愛生活又如何呢？她在39歲時，與比自己小1歲的美國作家納爾遜·阿爾格倫（Nelson Algren）相戀，並在以小說形式寫成的回憶錄《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中寫道：“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肉體。”她在接近40歲的時候說出這樣的話，著實令人驚訝。今日的日本女性，恐怕很少有人能在40歲時說出類似的話。

他的欲望改變了我。長久以來毫無情趣、身材走樣的我，再次擁有了肉體。我的雙乳、腹部和生殖器，煥發出新生。^④

我仿佛回到了20歲。我正在經歷初戀，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用我已經老去的生命，用我不再年輕的身體，為我心愛的男人創造幸福，這是何等的幸福啊！^⑤

波伏娃認為自己已經40多歲了，所以性生活已經結束了嗎？顯然沒有。她說“我仿佛回到了20歲。我正在經歷初戀，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就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女高中生。

後來，波伏娃在44歲時與阿爾格倫分手，之後遇到了比她小17歲的電影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朗茲曼是她一生中唯一同居的男人，並陪伴她直到去世（見下文）。此時，波伏娃的終身伴侶薩特又如何呢？眾所周知，薩特的女性交際網非常複雜。不過，關於薩特的事，應該由研究薩特的專家來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波伏娃所經歷的他者的老去與死亡

衰老的盡頭是死亡。“死亡”常常被冠以“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因為沒有人能夠親自記錄自己的死亡經歷。波伏娃一生中經歷了三次令她痛不欲生的死亡。第一次是她年輕時的好友“Zaza”，即伊麗莎白·拉庫萬（Élisabeth Lacoïn）的去世，但Zaza的死亡與衰老無關。第二次是她母親的離世。當波伏娃55歲時，她的母親因癌症去世。波伏娃稱之為“安詳辭世”，並以此作為母親回憶錄的書名。第三次則是薩特的離世。

① 『老い』（下卷），第413頁/新裝版，第89頁。

② 『老い』（下卷），第378頁/新裝版，第54頁。

③ 大工原秀子：『老年期の性』，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1979年。

④ 『ボーヴォワール著作集9 レ・マンダラン（下）』，朝吹三吉訳，京都：人文書院，1967年，第33頁。

⑤ 『ボーヴォワール著作集9』，第196頁。

波伏娃負責照護母親，但在母親臨終的那一刻卻未能趕到，在場的是她的妹妹埃萊娜，她在波伏娃的著作中以“普佩特”之名出現。母親因癌症晚期而住院，照料臨終的母親對波伏娃來說無疑是段極其艱難的時光。但她卻形容母親的死為“安詳辭世”，原文為“甜蜜的死亡”（une mort très douce），這一點令我頗為驚訝。

目睹母親離世的妹妹曾哽咽著哭泣，說道：“醫生說病人會像蠟燭一樣燃燒殆盡，但根本不是那樣，完全不是那樣。”

儘管如此，陪護護士還是欲蓋彌彰般地告訴波伏娃：“不，夫人確實走得很平靜。”^①

波伏娃接受了護士的說法，她說：“事實上，相對而言，我母親的死亡是平靜而安詳的。”^②儘管她親眼見證了母親臨終前不斷抗拒死亡，反復說著“我不想死”，她卻矛盾地將母親的死亡視為安詳辭世。

“死亡”並非相對的，而是絕對的。對於每個人來說，死亡只有一次，無法與他人的死亡進行比較。儘管如此，波伏娃還是將一位由兩個女兒守護床前、護士陪伴左右並接受精心治療的資產階級女性在醫院的死亡，稱為“安詳辭世”。可以說，她對母親的死亡持極為冷靜且疏遠的態度。然而，波伏娃本人也曾向薩特坦言，在經歷母親死亡的過程時，她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劇烈情感波動。

波伏娃與母親的關係一直較為緊張。波伏娃的妹妹比她漂亮，母親常常拿她倆做比較，並對波伏娃說：“像你這樣沒有姿色的女孩，必須努力學習才行。”於是，波伏娃便專注於學業。她在書中寫了許多對母親的苛責之詞。如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她為何將母親的死描述為“安詳辭世”。

對波伏娃來說，薩特的死亡比以往任何一位親友的離世都更加悲痛。她在《告別的儀式》中詳細描述了薩特的晚年：他的舌頭開始疼痛、說話困難，小便失禁，行走艱難，步履蹣跚，經常摔倒。他患有糖尿病，伴隨腦部循環障礙、血管狹窄、高血壓，並頻繁出現高血壓發作導致的麻痺。隨著病情發展，他的記憶力逐漸喪失，有時神志不清，說出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他不得不戴上假牙，視力也減退了一半。儘管醫生禁止他飲酒，但他還是悄悄讓親密女友為他帶酒，並繼續飲用，從未停止過吸煙。

根據波伏娃的說法，薩特在67歲時曾說：“我的寫作生涯就此結束了。”在68歲時，他稱自己為“行屍走肉”。波伏娃過於直白地描繪了薩特晚年的衰老與病態，以至於遭到了薩特粉絲的抗議。在此期間，薩特繼續寫作他的最後一本書《家中的傻兒子》。同時，他在一位名叫皮埃爾·維克托（Pierre Victor）的猶太裔埃及人的奉承下迷失自我，發表了違背自己意願的言論，最終失去了《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上長期合作的朋友們的信任，晚節不保。

對波伏娃來說，伴隨薩特晚年的這段漫長時光，成了為告別準備的儀式。正如書名所示，它確實成為了“告別的儀式”。《告別的儀式》的原作標題中，“告別”一詞雖然使用了相當於“再見”的問候語，但此處的“再見”並非意味著“再次相見”的“au revoir”，而是“再也不見”的“à dieu”，明確表達了永別的含義。

他的死會將我們分開。我的死將不會讓我們再次相聚。事實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生命能夠彼此共鳴如此之久，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③

① シモーヌ・ド・ボーヴォワール：『おだやかな死』，杉捷夫訳，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95年，第130—131頁。

② 『おだやかな死』，第140頁。

③ 『別れの儀式』，第157頁。

波伏娃是無神論者，她不信仰宗教，也不相信來世或靈魂的存在。這段話正是她典型的表達方式，言辭決絕而清晰。

波伏娃本人的老去與死亡

波伏娃本人的離世又是怎樣的呢？由於她無法描述自身的死亡，我們只能通過陪伴她到最後的朗茲曼的證言來了解。

1980年（引用者注——薩特去世）到1985年（引用者注——波伏娃去世的前一年）的這5年，對波伏娃來說，是因薩特離世而籠罩在深深哀痛中的一段歲月。卡斯特爾（引用者注——波伏娃的昵稱）深陷悲痛之中，甚至毫不避諱他人目光。……我盡可能地陪伴她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幾年。……直到1986年，在她去世前的這幾年間，於我而言，可以說是一段幸福的時光。^①

波伏娃在去世前被緊急送往醫院，最終在重症監護室搶救無效去世，享年78歲。

她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生命僅靠人工手段勉強維持。插著管子的她無法開口說話，甚至連頭部都無法動彈。我只能坐在她身邊，緊緊握住她的手。一根粗大的管子從她的口中插入，她的眼睛是唯一還能透露出生命跡象的地方，但目光卻始終凝滯。^②

波伏娃在重症監護室裡迎來了全身插滿導管的臨終時刻。朗茲曼說道：“只需拔掉管子，她就能解脫。”

此時，朗茲曼剛剛發佈了他在前一年完成的巨作《浩劫》（1985年）。該片在世界各地上映，使他迅速成為享譽國際的名人。尤其是在猶太亡命者擁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美國，這部作品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朗茲曼因此榮獲了美國猶太人組織“B’nai B’rith”頒發的自由獎——該組織長期與反猶太主義抗爭，並應邀出席了在洛杉磯舉行的頒獎典禮。根據他的回憶錄記載：

我不能長時間將卡斯特爾置之不理，於是訂了一班從巴黎直飛洛杉磯的航班。我本計劃抵達後立刻參加頒獎典禮，朗讀在飛機上匆匆完成的演講稿，並於第二天一早離開。^③

當時醫生對朗茲曼說：“在你回來之前，她應該不會有事。”然而，在洛杉磯機場迎接朗茲曼的，卻是波伏娃的訃告。

聽聞波伏娃去世的消息，我悲痛欲絕，強忍悔恨，將她的離去深埋心底，出席了那場盛大的頒獎典禮。^④

參加完典禮後，朗茲曼匆匆返回巴黎，在太平間與波伏娃的遺體再次相見，隨後不得不立即著手安排她的後事。

波伏娃留給後世的課題——“對待老年人的態度，可以用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成熟度”

波伏娃留給我們這樣一個課題：社會應該如何對待老年人。既然“老去是文明的恥辱”，那麼“老去”便不僅是一個心理問題，更是一個與文明和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有學者曾指出，

① クロード・ランズマン：『パタゴニアの野兎——ランズマン回想録』（下），中原毅志訳，京都：人文書院，2016年，第298頁。

② 『パタゴニアの野兎』（下），第299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

“對待女性的態度，可以用來衡量這個社會的成熟度”。如果將這句話中的“女性”替換為“老年人”，也同樣成立。從波伏娃撰寫《老去》至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在這段時間裡，有不少國家成為了福利型國家，日本也設立了護理保險制度。波伏娃去世後，老年人的福祉不僅在北歐等福利先進國家取得了顯著進展，在其他國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波伏娃曾說：“在法國，救濟院（Hospice）和醫院（Hôpital）的邊界模糊，令人歎息。”^①在過去，日本老年人可享受免費醫療的時代，曾有過“社會性住院”的說法。那時，許多老人被遺棄在醫院的大通間病房裡，無人認領，醫院成了“棄老場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在20世紀60年代，法國也經歷了類似的情形。波伏娃曾到訪相關場所並對此進行了報導。她描述，在一家兼具養老院和醫院功能的機構中，一個大房間裡竟然容納了50多位老人，他們全都躺在床上。這個房間被稱為“腐爛室”，空氣中瀰漫著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混雜著衰老、排泄物和褥瘡腐爛的氣味。這種情況下，“入住救濟院對於老人來說是一種悲劇”^②，因此“74%的老人都不願意入住養老院”也就不足為奇了^③。然而，“如果勸說無法讓老人妥協，他們（家屬）會毫不猶豫地撒謊，甚至訴諸暴力。例如，他們可能會先勸老人暫時住進養老院，繼而將其遺棄在那裡”^④。

波伏娃對患有認知症老人的洞見，至今仍然適用。

一位被兒子強迫放棄事業的老人，赤身裸體地在庭院中遊蕩。但他的這種脫衣行為——就像李爾王撕碎自己的衣服那般——是對自身遭受（所有權上）的剝奪的一種象徵性表達。^⑤

她將患有認知症的老人的這些行為解釋為抗議行為。

老年人的許多行為都帶有抗議性質，因為他們的處境使抗議成為生存的必需品。……大小便失禁往往就是一種報復性抗議。……老年人中常見的異常行為，例如遊蕩（引用者注——在現代日本，這種行為被稱為“徘徊”）也是如此。由於在家中無所事事，一位老爺爺瞞著家人，在外遊蕩了數日。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尋找什麼，但總覺得自己似乎在尋找某樣東西。通過這種方式，他向家人表明自己沒有他們也活得下去，同時也為家人可能會因此感到擔憂而暗自高興。^⑥

波伏娃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見解。相比之下，有吉佐和子的歷史性著作《恍惚的人》（1972年）則更多地引發了日本人對認知症的恐懼，令讀者感到不安。這部作品雖然說明日本社會了解到認知症的問題，但其側重點在於呈現疾病給家庭帶來的衝擊與困境。而波伏娃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以當事人內心活動為切入點，對患有認知症的老人進行了細緻而富有同理心的解讀，這種先見與洞察實在令人驚歎。

在“如何對待老年人，可以用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成熟度”這一點上，現實主義者波伏娃展現了卓越的洞察力，尤其是在分析衰老與社會富裕程度關係方面，她的見解尤為深刻。

哈林頓（引用者注——一位美國社會活動家）認為，只有富裕的社會才能負擔起大量的老年人。然而，富裕社會卻拒絕將豐盈的果實給予他們，只是讓他們“苟延殘

① 『老い』（上卷），第295頁。

② 『老い』（上卷），第297頁。

③ 『老い』（上卷），第294頁。

④ 『老い』（上卷），第254頁。

⑤ 『老い』（下卷），第568頁/新裝版，第244頁。

⑥ 同上。

喘”，僅此而已。^①

例如，在19世紀的美國，“人們認為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不應享有任何權利，他們將老人視為懶漢、老古董和廢物。撫養老人的義務本質上屬於家庭”^②。可見，整個社會對老年人缺乏應有的尊重與關懷。

在調查養老院環境時，波伏娃有一個重要發現：住在大房間裡的女性和住在單間裡的女性存在驚人的差異。後者的特徵如下：

她們注重儀表，喜愛讀書或做編織，還會時不時與醫生開開玩笑。……只要女性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小小空間和片刻寧靜，她們的生活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③

為了維護老年人的尊嚴，在老年人護理設施中設立單間應該成為標準配置。在日本，“單間護理”的理念直到2000年以後才開始普及。然而，只有那些有經濟能力承擔單間費用的人，才能入住單間。貧窮的人只能住在大房間裡，這就是日本的現實。沒有經濟能力，就不能享受單間護理，這明顯反映出社會階級差距。

波伏娃的理想如下：

在一個涵蓋各個年齡層的集體住宅中，設立一個既獨立又能夠與其他年齡段的人共用一些設施（如食堂等）的老年人住宅——這樣的養老院可能會更加理想。^④

在那個時代提出這樣的願景，確實卓爾不群。彼時，美國的“太陽城”（Sun City）老年社區已經出現，並作為老人的理想家園推廣至全世界。波伏娃也提到了這一點，但對其提出了批評，因為她對於只讓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居住的觀點持否定態度。她認為，理想的養老方式應是讓老年人與其他年齡層的人共同生活和互動。波伏娃的提議與日本目前最前沿的居住模式——多代同堂共用住宅並無二致。她所抱持的願景如今已逐漸成為現實，而她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已經超前提出了這一構想。

波伏娃離世後的女性主義及抗衰老主義

波伏娃去世後，出現了對年齡歧視的深刻批判。批判年齡歧視主義，即“反年齡歧視主義”（anti-ageism），具有截然不同的兩個維度。

其中，一個維度認為，過去的老人與現在的老人有所不同。誠然，現在的70歲與“二戰”前的70歲差異顯著，江戶時代的“隱居老人”往往只有40多歲。因此，這一維度的反年齡歧視主義觀點主張，現在的老年人依然充滿活力，不應輕視他們，而應將老年人的形象正面化。

而另一個維度的反年齡歧視主義則認為，人無論如何都會衰老，這有什麼問題呢？老年人弱不禁風又有什麼錯？

令人驚訝的是，在女性主義者中，也存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反年齡歧視主義觀點。美國的“女性解放運動之母”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波伏娃之後，於1993年出版了《生命之泉噴湧》（*The Fountain of Age*）^⑤，這本書採用了前一種觀點。另一方面，與弗里丹年齡相仿的芭芭拉·麥克唐納德（Barbara MacDonald）幾乎在同一時期寫下了一本觀點完全相反的著作——《致女性運動的公開信》（*Look Me in the Eye: Old Women, Aging and Ageism*）。我特別想與大家

① 『老い』（上卷），第286頁。

② 『老い』（上卷），第282頁。

③ 『老い』（上卷），第302—303頁。

④ 『老い』（上卷），第293頁。

⑤ ベティ・フリーダン：『老いの泉』，山本博子/寺澤恵美子訳，東京：西村書店，1995年。

分享的，是麥克唐納德書中的一段話。

三、對某位老年女性說：“你和其他老年女性不同，你很有趣、有幹勁、生氣勃勃。”我不認為這樣的評論是對她的讚美。如果那位女性把這些話當作讚美而接受，那麼實際上你就是社會排斥老年女性的幫兇。

四、不要對老年女性說：“您身體可真好！您可比我們都能幹！”這樣的言辭不僅顯示出你的優越感，還表現出你對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而感到驚訝。如果這種話語讓其感知到自己的年老，就會成為對她的一種貶低。^①

每個人都會衰老。如果將對待衰老的態度分為接受或拒絕兩種的話，麥克唐納德屬於前者，而弗里丹則屬於後者。就弗里丹而言，她所主張的反年齡歧視主義，旨在提倡年輕和生產力的價值，這與前文提到的抗衰老思想相近。然而，芭芭拉·麥克唐納德的反年齡歧視主義卻並非如此。我贊同麥克唐納德意義上的反年齡歧視主義，在我看來，反年齡歧視主義和抗衰老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宣導尊重衰老的自然過程，而後者則試圖逃避或否認這一過程。

抗衰老與安樂死的思想

顯而易見的現實，正如波伏娃所言，最長壽的老人通常是“生活在文明社會中的高經濟階層的城市居民”。從流行病學的角度看，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不同國籍、階層和種族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而在那些“生活在文明社會中的高經濟階層的城市居民”中，或許會出現弗里丹那樣的抗衰老思想：“老年人也可以如此健康，不要僅僅因為年齡而將他們視為老人。”

目前在日本，盛行著延長健康壽命的運動。然而，儘管健康壽命得以延長，之後的“虛弱期”，即依賴他人照顧的階段，並未因此消失。目前，厚生勞動省正在推進行一項全國性運動，致力於縮短這一虛弱期。如果生命是有限的，那麼在其中延長健康壽命就能縮短虛弱期。但如果健康壽命延長帶來生命整體的延長，那麼虛弱期可能也會相應延長。

虛弱期的存在意味著人在一段時期內會變得虛弱，但不會立刻死亡。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旦人們身體虛弱，往往很快因感染或其他併發症而死亡。而正是文明社會的進步創造了這樣的條件：人們即使變得虛弱也能延續生命，不會立刻死亡。

試圖縮短虛弱期的想法與前文提到的“成功老齡化”概念如出一轍。衰老的課題已經轉變為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延長健康壽命。如果希望實現“成功老齡化”，那麼在健康壽命期間去世便是理想的狀態。現代文明社會本應追求人們即使變得虛弱也能繼續活下去，但現實卻恰恰相反，它要求人們一旦變得虛弱就應該盡早死去。

大家是否看過《歲月自珍（PLAN 75）》（導演：早川千繪，2022年）這部電影？影片開頭便宣佈了一則公告：“今日，日本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賦予75歲及以上公民死亡的權利。”最近，有個名叫成田悠輔的“媒體文化人”發表了極端言論，聲稱老年人應該集體自殺。

在本次講座開始前的致辭中，存在主義思想協會的理事長提到應該以積極的態度看待老去。但我要說的是，老去是一種消極的過程，不可能積極。每個人都會步入“衰老”，我將“老”與“衰”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人會歡迎“衰弱”的到來。

安樂死的思想可以歸結為：“如果你活力不再，那就趕快去死吧。”這種觀念已經開始在社會上出現，並被媒體接受。電影《歲月自珍（PLAN 75）》的導演早川千繪表示，她拍攝這部電

① バーバラ・マクドナルド/シンシア・リッチ：『私の目を見て——レズビアンが語るエイジズム』，寺澤恵美子/山本博子/久保とし子/N・ミナイ訳，東京：原柳舎，1994年，第131—132頁。

影的初衷是想對這種思想進行批判。然而，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心中泛起強烈的不適。因為在這部電影中，老年人所擁有的僅僅是“死亡的權利”，而沒有“生存的權利”。如果沒有提供其他可替代的選項，那麼這種所謂的“自由選擇”根本不能稱之為真正的自由。

近年來，編劇橋田壽賀子女士在日本提出了關於安樂死的問題，她寫了一本名為《請讓我安樂死離世》的書^①。基於這本書，《文藝春秋》策劃了一個大型的專題報導，針對被稱為“有識之士”的人群進行了問卷調查。令我感到震驚的是，在60位回答者中，只有包括我在內的4個人反對安樂死和尊嚴死。^②橋田女士為什麼會選擇尋求死亡？她說，因為再也接不到工作了。她認為自己失去了生產力，這就是她選擇死亡的理由。此外，她還提到不想給別人添麻煩。許多人都表示，如果必須依賴他人照顧，還不如選擇死亡。然而，對於薩特和波伏娃而言，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死亡自主決定權”呢？

衰老、死亡與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所說的自由究竟是什麼？薩特曾說：“人註定被判以自由之刑。”然而，存在本身是被給予的，而非一種選擇。在近代自由主義法學中，自由只有在存在完全可替代的選項時才得以成立。但能夠行使這種自由的責任主體，其實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虛構。

更何況，衰老是與逐漸失控的身體共處的過程，是經歷自己的身體逐漸成為“他者”的過程。我一直主張老年人的自主決定權，所以經常被聽眾指責，他們說：“既然上野你提倡老年人的自主決定權，卻不支持安樂死這一‘死亡的自主決定權’，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然而，我一直在想，就像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那樣[很抱歉，因為“自己”和“事故”同音（在日語裡都讀作jiko），我的PPT裡把“自己決定權”誤寫成了“事故決定權”，不過人的出生本身就像一場“事故”（笑），我們也無法決定自己的死亡。

即便如此，如果我們仍然尊重像波伏娃那樣行使自由的人，這意味著什麼呢？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會稱她為“自由的個體”，因為她能夠將“偶然”轉化為“必然”，再將“必然”轉變為“選擇”。波伏娃偶然生為女人，偶然是法國人，偶然生活在那個歷史時期。在这一切中，她將偶然變為必然，將必然轉化為選擇，寫下了《第二性》和《老去》等著作。在那本厚重的《老去》中，最讓我深受觸動的一個片段，是關於歌德的描述。

有一天，歌德在演講中突然失去了記憶。在長達20多分鐘的時間裡，他一直保持沉默，靜靜地注視著聽眾。由於對他的尊敬，聽眾們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之後，歌德若無其事地重新開始了演講。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出，歌德表面上的鎮定，實際上是在克服了種種輕微功能退化之後的結果。到了晚年，歌德變得非常容易疲憊，只能在上午工作，也放棄了旅行。據說，他白天還時常會打瞌睡。^③

這就是老去。這就是衰老。波伏娃在她的書中平靜地記錄下這一切。

人都會逐漸衰老。自己的身體也會變得越來越難以掌控。就像晚年的薩特那樣，變得令人不忍直視。許多人希望自己直到最後都不要變成那樣，渴望以某種體面的方式度過餘生，希望不要失去生產力，希望能夠對他人和社會有所貢獻。然而，每當有人對我說，即使老了也想為他人做些貢獻時，我總會這樣反問他們：“如果不能為他人做貢獻，就不配活著嗎？”

① 橋田壽賀子：『安樂死で死なせて下さい』，東京：文春新書，2017年。

② 「安樂死は是か非か——大アンケート 著名人60名の賛否を公開する」，『文藝春秋』，2017年3月号，第240—257頁。

③ 『老い』（下巻），第367頁/新裝版，第43頁。

即使不再有所貢獻也能夠繼續活下去，高齡者的處境有所改善，正是文明進步的證明。我們的下一個課題是：進一步改變文明的形態，把目前以發展和競爭為主導的社會，轉變為一個相互支持和分擔的社會。雖然“相互依存”與“獨立”相左，但我們的努力目標，正是建立一個“以相互依存為榮而非為恥的社會”^①。

最後，我想以波伏娃的以下這段話作為結束語：

像世上所有人一樣，我不能假設無限，但我不願接受有限。我希望我的人生刻在人類冒險之旅中，而人類冒險之旅能夠無限延續。我喜歡年輕人，希望在他們身上，我們的種子（人類）能夠得到延續，人類能夠擁有更加美好的未來。如果沒有這個希望，我無法忍受自己不斷地老去。^②

波伏娃去世後，伊麗莎白·巴丹戴爾（Élisabeth Badinter）在悼詞中寫道：

“這位從未渴望過擁有孩子的女性，卻成為了全世界數百萬女孩的精神之母。這是多麼矛盾，又多麼成功啊！”

感谢各位的垂聽。

[責任編輯：廖媛苑]

① 上野千鶴子：『家父長制と資本制』，東京：岩波現代文庫，2008年第371頁。

② 老い 下巻』四八七頁/新裝版、一六三頁。